

斯大林政權下的私領域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xxxviii+739pp.

余敏玲*

作者 Orlando Figes 在出版本書之前，即因細膩地描述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的俄國社會和文化史而聞名於西方學界。他的著作有一特色，就是以重要的政治事件如革命和內戰為主幹，精彩地描繪出大時代的文化和社會氛圍；並以同理心闡析平常百姓如何回應動盪時代的重大事件和政策。¹ 本書也不例外，作者再度發揮他長於敘事的能力，將斯大林(Joseph V. Stalin, 1879-1953)統治下的受害者以及受害者成為加害者的心路歷程，娓娓道來。

這是英文著作之中，第一本時間跨度最大、涵蓋面廣，及有系統談論蘇聯私領域的研究。本書的主旨在於探討斯大林的高壓統治，人民如何生活在恐懼之中，特別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恐懼被捕、被流放，恐懼隱瞞的身分被揭露等等。百姓在恐懼之餘，不敢高聲談論國事、身邊事，只能透過竊竊私語，向家人或值得信任的人表達個人的想法，或傳遞有別於官方的俄國傳統價值，或透過耳語向有關當局告密，藉以自保或得到其他好處，諸如升遷、免於開除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89);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New York: Viking, 1997);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相對而言, *Natasha's Dance* 比其他的著作更著眼於菁英分子的文化生活。

學籍、加入共青團等。由書的副標題可知，本書強調斯大林時期老百姓的私人生活，以及古拉格(Gulag)集中營犯人的心理及其經歷如何影響他們日後的生活態度和思維。全書共有九章，按時間順序排列，從 1917 年一直寫到 2006 年。

全書的重點在處理人民如何回應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研究的對象以受害者為主，這與作者使用的資料來源有密切的關係。由於檔案館的相關文獻對百姓私生活的記載不多，Figes 特別仰賴回憶錄、日記、人民的申訴信、私人書信和口述訪問，其中尤以口述訪問為本書資料的主要來源。作者啟動了一個十分龐大的採訪計畫，僱用非政府組織的紀念協會(Memorial Society)成員，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皮爾姆(Perm)組成研究團隊，由作者提供問卷內容，訪問斯大林政策下的倖存者。這個研究團隊前後多次用電話採訪千人以上，作者由其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其標準是：(1)能夠代表某一社會階層；(2)有些個人家庭資料者。這兩個標準運用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問題不大，在皮爾姆卻遭遇困難，因為這個地區絕大多數的居民是富農或其他罪名的受害者，他們是被迫移居到皮爾姆，在匆亂離家之際，往往沒有帶走任何私人文件，許多人甚至連自己父母的照片都沒有。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八十歲，在作者完成書稿之前，已有 27 人過世（佔受訪者的 6%）。大多數口述訪問及其相關文獻均可從 <http://www.orlandofiges.com> 網站取得。

除了少數社會菁英（高幹、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之外，書中人物以富農、教士、小資產階級落後分子等蘇聯當局急欲去之而後快的社會群體為主。這些人大量遭到逮捕和流放，他們的子女或被送到其他家庭，或流浪街頭。秘密警察更樂於將這些人的子女安頓在孤兒院，同一家庭的子女多半被分送到不同的孤兒院。如果年紀還很小的兒童，還會被更改姓氏，讓他們忘掉自己的親生父母。這是蘇聯當局的政策，因為這樣既可以打散「人民之敵」的家庭，也有利於塑造新的認同和新的價值觀。

作者對於斯大林政權如何塑造蘇維埃新人，著墨頗多。蘇維埃新人的主要

言行就是以黨國利益為最大考量和原則，必要時應該犧牲小我。斯大林曾說過：「我們共產黨員是使用特殊的材料做成的。」十月革命後成長的這一代人，對革命的「英雄時期」有高度浪漫的想法，容易受到官方宣傳的影響。他們相信只要堅持自己的意志，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不能克服的障礙；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可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而且要能夠隨時準備犧牲自己。他們被灌輸要崇拜鬥爭，執行鬥爭是他們的使命，沒有鬥爭就無法成就任何事業。對於兒童和少年，官方宣傳最力的蘇維埃新人典型是帕夫利克·莫羅佐夫(Pavlik Morozov, 1918-1932)。此人生長於西伯利亞西部一個偏遠貧窮的農村格拉西莫夫卡(Gerasimovka)，距離烏拉爾山大城斯維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350公里，四周為勞改營和「特別居留地」（比勞改營更為艱苦的集中營）所圍繞。1931年秋末，蘇聯大力推展農業集體化之際，14歲的帕夫利克向秘密警察揭發父親是「富農」，罪行是向被流放於「特別居留地」的富農販售偽造的證件，結果他父親被逮捕、流放，未幾槍決。次年初秋，帕夫利克的屍體被發現棄置於村外的森林，根據官方的調查報告顯示，這起謀殺案乃是他的祖父和叔叔等親人所為。作家高爾基(Maksim Gorky, 1868-1936)獲悉帕夫利克的作為後，極力讚揚他是大義滅親，並呼籲為這個年輕的殉道者建立紀念碑；帕夫利克頓時成為全國宣傳的蘇維埃新人典型，藉此鼓勵子女揭發父母的「政治不正確」言行。事實上，帕夫利克原是當地的一個小混混，來自於一個破碎的家庭，父親在外另有女人，棄家而去，留下精神異常的母親讓他照料。他並非如官方宣傳所言是少先隊隊員，但很顯然十分渴望成為其中一員（頁 122-124）。必須一提的是，1935年蘇聯當局重新提倡家長權威的時候，官方也重新詮釋對帕夫利克的崇拜：對他的揭發行爲低調以對，轉而強調他努力工作，在校守規矩等新的美德。

全書深度分析為何告密文化盛行；作者走入告密者的內心世界，試圖解釋他們為什麼會和有關當局合作。在1920-1930年代揭發別人是官方稱許的一種美德，而不被當作自私的行爲。每個布爾什維克的第一責任就是保持高度警

覺；凡是忠誠的蘇聯公民都應該向警察報告他們所偷聽到的談話。作者將告密者分為志願和非志願者兩大類。志願者多出於物質獎勵、政治信仰、對受害者有敵意之故；非志願者則是因為受到威脅恐嚇、或「出身不好」為了生存而告密，受害者也成了加害者。有些揭發之舉則是受到父母的鼓勵，他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因此融入蘇聯社會；也有些人藉此斷絕與家人的關係，以表示進步。帕夫利克的宣傳對生長在一般正常家庭的兒童的影響不大，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傳授子女傳統道德。不過，對許多生長於不幸家庭的兒童來說，帕夫利克典型正好提供他們逃離家庭黑暗的一個管道；因此可以發展傾向於官方所詮釋的「正確」政治意識，積極參與黨所號召的活動，並視少先隊為更高形式的家庭。所以帕夫利克對孤兒特別具有吸引力。

作者的研究顯示，共產黨在革命後意欲透過各種手段摧毀家庭，或如人道主義等的傳統價值，期望人人效忠於黨國。但是人的基本價值觀與倫理觀卻經常是透過家人傳承下來的。許多為祖父母所救和撫養的兒童，其舊價值觀就是透過祖輩留傳下來。同樣地，也是家庭的牽絆支撐了許許多多在集中營的人，使他們不至於倒地不起。對許多劫後餘生的人而言，家庭代表他們唯一可以信任的關係，讓他們有歸屬感。他們的經歷不是弱化，而是強化家庭的價值以及對家庭的依賴。再者，即使在整肅的高峰期，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仍有善心人士如同學及其家長、鄰居或朋友等，對受政治迫害者的子女伸出援手，其中，老師是所有行業中救助兒童最多的人，特別是任教於高幹子弟學校的老師。他們有許多出身於舊知識分子家庭，擁有傳統的人道主義價值觀（頁 296）。

這樣看來，應該如何評估蘇聯當局塑造蘇維埃新人的成效？作者的回答是：如果家裡有另一套價值系統（如革命前的舊知識分子或貴族），可與蘇聯價值系統相抗衡者，那麼他們就比較不容易被蘇聯的宣傳牽著鼻子走；但是對於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工農、或被放在孤兒院的知識分子後代而言，他們就很容易受到蘇聯宣傳的影響。

本書有意反駁 Jochen Hellbeck 關於蘇聯價值如何被人民內化的論述。

Hellbeck 透過 1930 年代許多日記的研究，堅信當時許多人迫切地想改造自己，迎合或認同新的蘇聯理念和價值。²反觀 Figes 則較重視價值外鑠的問題，認為蘇聯價值是透過宣傳或懲罰性手段，強加於人。許多舊的信仰和價值仍留在人們心中，但受到壓抑；他們想「成為蘇維埃人」，不是出於內心的渴望，而是出於畏懼，不得不在表面上迎合。對於許多富農的子女而言，融入蘇聯體制是他們僅有的自保或求生之道；信仰蘇聯體制及理想，和蘇聯當局合作，可以合理化他們所受的苦難，如果沒有這個崇高的目的，他們會難以承受所有不公的處罰而感到絕望。正因為外在環境的強大壓力，使得許多人過著兩面生活：表面上和蘇聯的價值與理想聯成一氣，將真實的自我秘密隱藏在私領域。在 1930 年代的大整肅時期，秘密和欺騙幾乎成了每個蘇聯人生存的重擔，結果產生一種新的人格和新社會。特別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處於恐懼、消極、退縮、羞恥之中，而且低人一等，使同一個人一方面秘密地憎恨蘇聯政權，一方面卻又想克服這些情緒，並獻身於蘇聯政權標榜的理想。人民常在這種雙重性中失落了自己。不過，如果多數人民都過著雙重生活，一旦共產黨政權崩潰，外在的束縛解除了，人們應該會痛恨過去斯大林所宣傳的蘇聯價值才對。但是我們也看到在蘇聯解體之後，許多中老年人還是緬懷蘇聯價值，可見有些人已經將官方宣傳的價值內化了。

此外，Figes 以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Konstantin Simonov, 1915-1979) 為例，進而說明這些新菁英分子為什麼要支持斯大林的政權。西蒙諾夫的母親出身貴族世家，他卻急欲棄絕其母秉持的革命前舊有的道德價值，認同蘇聯當局提倡的新價值，致使他家中的新舊價值常起衝突。西蒙諾夫在大整肅時期，做了不少有悖於道德的事。更引人非議的是，他在二次大戰後蘇聯的反猶太人運動中，充當官方在文藝界的打手。當時他在文壇上已經享有盛名，本可以選擇無所作爲，保持沉默，縱然有可能會因此失去特權和作家協會的領導地位，

² 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但並不會導致被捕或流放。結果他選擇了遵循黨的路線發言，攻擊猶太裔作家。作者認為他是個悲劇人物，將公德、紀律、責任和臣服於黨的路線混在一起；他迷戀斯大林及其權力，使自己迷失在斯大林體制中，成為其中的一員（頁 503）。不過，晚年的西蒙諾夫對自己在斯大林時期的許多作為感到羞愧不已，後悔自己在大整肅時期與大多數沉默的蘇聯民眾默許那些暴力，變得習慣於邪惡；不但斯大林不可原諒，他自己更不可原諒。³西蒙諾夫的回憶錄完成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 1906-1982)當政時期，他的懺悔和勇於認錯，也顯現出俄國知識分子高貴情操的一面，令人欽佩。

本書在一開始述及一對結縭多年、居住在列寧格勒的夫妻，居然可以隱瞞各自的出身長達二十餘年。一些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聽到這樣的案例，直呼這在中國不可能發生！這也令人聯想到本書提及的斯大林統治，在許多方面可與毛澤東的統治作一比較，特別是關於家庭出身以及黨國體制的社會控制。

蘇聯內戰時期的政治清洗以社會出身為目標，受清洗的社會群體是「落後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富農」。如果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布爾什維克，除非有特別的罪名，一般可免於受清洗。到了 1920 年代中後期，則日漸重視私人行為或個人「不正確」信念的清洗（頁 34）。若以政治迫害之深、牽連人數之廣而論，蘇聯的大整肅堪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相比；而蘇聯的文化革命(1928-1931)重視出身論，主要表現在教育。⁴大整肅時期更重視的是政治忠誠度，出身相對地成為次要因素。例如，被送到古拉格集中營的工農出身技術人員，也是因為政治理念或行為、或因莫須有罪名而被流放（頁 214-226）。而在中國大陸，工農階級若犯了政治錯誤，被處罰的機率相對地要少得多。

³ Константин М. Симонов(西蒙諾夫),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И. В. Сталине* (我這代人的見證——關於斯大林的思考)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0), с. 55。這本回憶錄首次面世於 1988 年。

⁴ 雖然蘇聯的文化革命也迫害出身資產階級的專家和工廠經理等，但是受迫害的人數和規模遠遠低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蘇兩國文革的歧異之處甚多，詳見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in Abbott Gle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eds., *Bolshevik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79-293.

不過，即使在斯大林恐怖統治的頂峰期，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仍然可以透過用功讀書、努力工作，儘管有時需要隱瞞身分與偽造證件，從而重新得到社會的接受和認可。許多富農子女若想要被蘇聯政府接受，成為社會有價值的一員，與政治或個人認同的關係較小，與工作或學業上的努力和勤奮更有關係。（頁 145-147、647）。例如，安托妮娜·戈洛維納(Antonina Golovina, 1923-2006)是富農家庭出身，農業集體化時，全家被流放西伯利亞，從此身上貼著「階級敵人」的標籤。她不能進中學，也找不到工作，容易受到迫害。儘管受到歧視，但學業成績好，逐漸給她信心，甚至在 1939 年加入共青團。團領導對她的出身睜隻眼閉隻眼，因為他們看重她的能力才幹和旺盛的精力。她在 18 歲時，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偽造證件以便進入列寧格勒醫學院就讀。這樣的案例很多，俄國第一位民選總統葉爾辛(Boris N. El'tsin, 1931-2007)的經歷，亦是一例。他的祖父和父親均曾因為「富農」的罪名而被捕與流放；但是他初次填寫幹部表格，社會出身那一欄填的是「農民」，⁵沒人追究，他也順利進入大學就讀。

其次，蘇聯當局對人民的控制要比沙皇時期嚴密許多。不過，直到 1930 年代初，蘇聯人民仍然常可藉由逃往異地，隱瞞出身，重新生活。人們常常透過賄賂或購買偽造的證件，取得新身分，幾乎在每個城市的市場都可買到假證件。有時甚至根本無須用錢購買，許多人乾脆扔掉舊證件，向不同的單位申請新證件，就有新的身分。反觀中國大陸，姑且不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將個人出身深化成血統論，加上許多內查外調的活動，讓人民幾乎無所遁形；即便在 1950 年代，倘若想要隱瞞出身，立足於城市，又談何容易！中共建國初期，透過鎮反運動建立的政治審查與檔案管理制度，加上 1953 年建立以戶口制為

⁵ 葉爾辛的第一本傳記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指定議題的自白)(Москва: Огонек-Вариант, 1990)出版時，葉爾辛的母親並沒有告訴訪問她的人關於其夫被捕的事，直到第二本傳記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總統筆記)(Москва: Огонек-Вариант, 1994)才披露。這兩本書均可在葉爾辛基金會的網站<http://www.yeltsin.ru/yeltsin/books> 上找到。目前筆者見到的葉爾辛的英俄文傳記中，只有 Aron 的書觸及他隱瞞出身的問題。見 Leon Aron, *Yeltsin: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11.

中心，單位、街道、派出所一體的綜合治安保衛制度，黨在城市裡的基層結構全面確立，⁶這使得有出身問題或歷史問題的人無法逃出綿密的政治檔案蜘蛛網。像本書提到的許多俄國人，改名換姓逃到另一城市，或偽造家庭背景而能上大學，在中國幾乎難以想像。

再者，即使在大整肅時期，蘇聯共青團的權威也不是鐵板一塊。例如，曾有共青團員膽敢在公開場合表達與黨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意見，這位團員不但沒有因此被開除團籍，反而得到其他團員的支持，輔導員也改變初衷（頁 347）。又如，在列寧格勒一個聰明的中學老校長以斯大林的話：「兒子不需要為父親負責」，⁷救了一個 15 歲「出身不好」的學生，使她沒有因為拒絕揭發已經成為「人民之敵」的母親，而被開除共青團團籍。這在中國，恐怕連抗議者或護航者都會受到處罰。

蘇聯在大整肅時期，因為莫須有罪名而被逮捕、流放、槍殺者難以統計，可謂斯大林恐怖統治的高峰。到處都是告密者，幾句不小心的話都會使人消失；大人告誡小孩，在公共場所絕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只有醉漢才會在公共場所表達自己的意見。人們怕說話致罪，但出於孤單、愁悶、恐懼，他們從書寫日記得到抒發感情的管道，日記遂成為個人脫離謊言的一個私領域避難所。例如，作家米哈伊爾·普里什文(Mikhail Prishvin, 1873-1954)將他所有的恐懼都寫在日記上；後來成為俄國中古史學者的阿爾卡迪·曼科夫(Arkadii G. Man'kov, 1913-2006)在當時出於孤獨，而將寫有反蘇思想的日記給一個鮮有往來的同學看。反觀中國在反右之後，特別是文革期間，絕大多數有寫日記習慣的人，不但停止寫日記，更不敢將日記隨便給陌生人看，甚至還得將已寫的日

⁶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04），頁 25。

⁷ 1935 年 12 月在一個大會上，一位年輕的聯合收割機手說，他會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鬥，雖然他是富農之子。斯大林當場回答：「兒子不需要為父親負責。」“Я буду бороться за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我將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共青團真理報），1935 年 12 月 2 日，第 2 版。

記燒毀。⁸換言之，相對於中國的文革時期，蘇聯人民即使在大整肅時期，仍可保有一點點私領域。

讀完全書，令人最感疑惑的是代表性的問題。本書處理的主要對象與資料來源是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所揭露的人民私生活也是以受害者為最大宗。至今關於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數字，仍然眾說紛紜；受害者的定義不同，產生的數字也會有所差異。不過，有份來自秘密警察檔案的數字可以作為參考。根據他們不完全的統計，在 1937-1938 年的大整肅高峰期間，秘密警察以「反蘇活動」的罪名，一共逮捕了 1,548,366 人，其中有 681,692 人被處決。⁹兩年之間，平均每天有 1,000 人被殺；當時全蘇聯的人口約一億六千萬左右，¹⁰等於全國有將近百分之一的人口被捕。這還是指直接被捕或被殺的受害者，尚不包括受害者家屬所受的牽連與迫害，也不包括農業集體化的犧牲者和二次大戰之後的另一波整肅人數，否則數字會更高。然而，即使如此，以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來代表所有老百姓私領域，似嫌偏頗。作者並未提及非受害者（不包括受害者成為加害者）的私人生活，他們是否為自己的言行感到興高采烈，或是也有一點心理不安等等。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曾謂，一直要到多年之後，人們方才了解到大整肅時期的密集逮捕、監獄中的酷刑和折磨等種種骯髒齷齪的事。他回憶 1938 年秋天，自己正是大三學生，也是共青團員。他寫道：「我們從哪裡知道這些逮捕？我們又為什麼要想這些？聽聞省裡的領導全都換了人，我們根本不在乎。兩、三位教授被捕下獄，也無所謂；畢竟他們不是我們的舞伴，說不定這樣會讓我們的考試比較容易通過。我們，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與十月革命同齡的人，正大步向前邁進，光明的未來正在等待我們。」¹¹索忍尼辛寫出了當時一些非受害者的生活和想法，也提供了

⁸ 王友琴，〈摧毀日記的革命〉，《黃花崗雜誌》（網路雜誌），2006 年第 3 期（總第 18 期），頁 63-85。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8/index_big5.htm (2009/5/5)

⁹ 轉引自 Р. Г. Пихоя (皮合亞),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蘇聯：權力的歷史，1945-199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0), сс. 123-124.

¹⁰ Alec Nove, "How Many Victims in the 1930s?" *Soviet Studies* 42:2 (April 1990), pp. 371-372.

¹¹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忍尼辛),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古拉格群島》(Москва: Новый

思考受害者是否為共相的角度。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對家裡有親友被捕或失蹤者來說，他們的個人境遇會在一夜之間天地逆轉；官方檔案當然不會有太多文件敘述這些人的境遇，必須藉助私人日記、書信和大量口述採訪等，而這也正是本書的主要貢獻之一。

其次，作者以西蒙諾夫為例，利用大量篇幅說明一個「出身不好」的人，如何積極求表現，認同蘇聯當局的主流價值，最後成爲一個忠誠的斯大林主義者。¹²然而，西蒙諾夫畢竟是蘇聯社會中的頂尖菁英分子，他的經歷能夠有多大的代表性，令人懷疑。

不過，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不應視爲缺陷；因爲一本書的篇幅本來就不可能涵蓋所有人民的私領域。作者能夠運用生花妙筆，引人入勝地描繪受害者的私領域，已經十分值得喝采。並且本書對於關心中國現代史發展的人而言，又多了一個重要性，那就是提供一個和中共革命與建國以來發展的參照視野。今年適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甲子，細讀和對照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會發現書中確有許多可以爲研究中共歷史者借鑑之處。例如，在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親友鄰居之間的告密和揭發文化同樣盛行。不同的是，斯大林政權主要透過秘密警察的機制來運作，毛澤東則比較依賴一波波動員群眾的鬥爭大會來進行。又如，毛澤東時代強調階級出身、要紅不要專，私人領域被壓縮的程度（特別是文革初期），遠遠超過斯大林政權。同樣實踐馬列主義的中國和蘇聯，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又爲什麼能夠實現這樣的差異？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中共黨史者進一步思考。

мир,1990), том 1, с. 155.

¹² 作者熟識西蒙諾夫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兒子阿列克謝(Aleksei)，因而知道阿列克謝母親家庭的事，也得以利用俄國國家文學檔案館的西蒙諾夫私人檔案。遺憾的是，也因本書的關係，使得西蒙諾夫與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女兒凱佳(Katia)在 2005 年 10 月決定，要到 2025 年，他父親的私人資料才能再度對外開放。